

谢阳举◎主编

ZHONGGUO SIXIANGSHI YANJIU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思想史研究

2012年卷

谢国群◎主编 ZHONGGUO SIXIANGSHI YANJIU

中国思想史研究

2012年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思想史研究.2012年卷 / 谢阳举主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9

ISBN 978 - 7 - 5161 - 1189 - 5

I . ①中… II . ①谢… III . ①思想史—中国—文集
IV . ①B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50649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张林
特约编辑 金泓
责任校对 孙洪波
责任印制 戴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1
插 页 2
字 数 355 千字
定 价 5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者的话

中国思想史是中国古老智慧的结晶，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需要的思想创新的重要精神养料，研究价值自不待言。

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被《史记》称为“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四塞之国”，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摇篮之一。长安城曾经是 13 朝王都；历时 1500 多年，中国封建时代闻名世界的周、秦、前汉、唐位列其中。西安方圆百余里之内，有数十万年前的蓝田猿人和大荔人遗址，毗邻炎黄部落兴起的根据地；这里是“礼乐之源”，周公在此制礼作乐，周礼是中华底层文明的奠基，也是儒家文化的源头；这里是“道德之归”，道家创始人、道教神化崇拜的老子，曾归隐于古扶风一带；这里是佛教圣地，号称佛教“第二故乡”，有中国佛教七大祖庭；这里是关学腹地，从张载到清末刘古愚，出现了一代代儒家宗师；这里也是多民族文化交汇的大熔炉，是连接欧亚经济文化交通的丝绸之路的起点，在中外文化和经济贸易交流史上产生过不可磨灭的作用。

西北大学坐落于人文荟萃、文明昌盛、历久弥新的古城西安。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为我国著名思想史家、历史学家、中国思想史现代学科开创者之一——侯外庐先生所奠基，思想史家张岂之教授所创立，现系中国思想史国家级重点学科点、国家 211 重点学科点、陕西省高校重点基地、国家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所薪火相传数十年，建立了研究梯队，争取在科学的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道路上有所推进。

为思想文化学术共同体提供一块自己的园地，这是我们的美好心愿，也属于我们义不容辞的分内之事。鉴于此，研究所于 1999 年决定推出首

辑《中国思想史论集》（不定期学刊）。创刊初衷是为了及时发表中国思想史及其相关领域的最新成果，进一步推动研究，活跃交流。到2008年已经公开出版三辑，每辑30万字左右，在学界有一定影响。其中《中国思想史论集》第一辑由张岂之先生主编，于2000年出版，该辑探讨的中心议题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收入的文章对近五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研究有关专题作了回顾，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方法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第二辑也由张岂之先生主编，于2003年面世，该辑是纪念侯外庐先生百年诞辰专集，主题是对中国思想史学科前辈侯外庐先生的怀念，所收论文主要是学者们在2002年西北大学举办的侯外庐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上的主题发言，兼收有范围广泛的专题论文。第三辑由张岂之教授和谢阳举教授合作主编，于2008年出版。该辑汇集了2007年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主办的“全国中国思想史学科建设研讨会”的部分成果，分设中国思想史理论探讨、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中国思想史专题研究、中国思想的现代价值研究等五个栏目，主要探讨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思想史思潮和学派、思想家及经典研究、中国思想史教学和研究生培养等问题。前三辑完全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资助出版，在此我们深致谢忱！

今年是国家“十二五”规划开局的第二年，目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祖国国力倍增，人文学术研究日益活跃，我们愿意加倍努力，克服困难，将学刊更名为《中国思想史研究》，今后将移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继续出版。学刊将恪守和实践前辈学人树立的严谨求实的学风，以深化和提高研究为宗旨，开展深层次的学术交流。

本辑由本人受命负责编辑，包括23篇论文，涉及中国思想史理论研究、宋明理学与经学研究、宗教思想史研究、政治思想史研究、比较思想史研究等方面。虽然由我领衔，但是离不开研究所同仁的奉献，张岂之先生逐篇审阅了全稿，个别篇章还做了改定，方光华校长一直非常关注学刊的编辑，夏绍熙博士协助我做了最初的编排工作，几位博士生参与了文稿校订和部分引文查核工作。这里我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自该辑起，我们决定进一步加强编辑力量，提高编刊质量，增强工作效率，努力拓展稿源，除部分名家约稿外，大部分稿件拟向海内外学术界公开征集，争取每年出版一辑；根据每辑需要，保持古代思想史、近代思想史、宗教思想史、比较思想史、思想史研究理论和方法、思想史动态、

书评等栏目，凡属于中国思想史文献学、经学、子学、儒学、玄学、理学、宗教思想、史学思想，以及政治、经济、科学等专科思想史的优秀稿件，均在征集之列。

鉴于本人和编辑小组学识、经验和能力有限，本辑的编选难免有诸多不足，希望学界不吝赐教，使我们的工作日益改进。我们深知，要办成一个得到学界比较认可的优秀学刊，尚待长期勤奋踏实的工作，也望学术界共同栽培灌溉，并扬鞭策进。

谢阳举

2012年3月18日

《中国思想史》2011 年修订版新序

张岂之^①

《中国思想史》一书于 1988 年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1992 年，我们对此书（有 70 余万字）加以缩写（40 万字），以同样书名，仍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2003 年缩写本出了第二版。以上两种版本都是按照大学历史学硕士生教材的要求去写的。

2002 年我应高等教育出版社之邀，和几位朋友重新写了一本《中国思想文化史》教材，2006 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此书的“序言”中有这样的话：“在本书撰写前，在设计全书的框架时，我们着眼于这样两点：一是中国思想文化的特色；二是中国思想文化的创新性。”全书力求以文化传承与创新作为一个中心加以阐述。

从时间上计算，我们从 1988 年开始编著《中国思想史》，到今年（2011 年）已有 20 多年；在这段时间里，我和合作的朋友们不但有了较多的大学教学实践经验，而且在中国思想史学术研究上也有了一些新认识，将它归结为一点，就是：大学人文学科研究生（主要是硕士研究生）的教材要有自己的特色，不同于大学本科生的专业教材；有新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教材编著者的）展现。没有创新，教材的生命力就会受到影响，不能只在“简要”、“提炼”上下工夫，还要有相当的学术厚度；不是人云亦云，而要有编著者的独立思考和研究成果，也就是说要有学术特色。它不仅仅是教材，同时也具有学术专著的特色，在某些重要的学术问题上不受篇幅的限制，力求作比较深入的阐述，以便在学术讨论中较全面地阐释自己的论点。教材可以是众人研究成果的汇集，但专著主要

① 张岂之，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所长。

是作者个人的研究心得。

由于有以上的理解，我计划与朋友们对《中国思想史》1988年版进行修订补充，将它修订成研究生教材参考，同时兼有学术专著性质的著作。本书的修订用了近两年时间，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1. 查阅全书引文，改正引证上的错误。是否彻底，现在不敢说，只能说尽了很大努力。2. 学术内容上有所增补。例如：关于中国思想史的社会历史背景，我国学术界在近些年来有不少成果可供参考。我们参加《中国思想史》写作的原作者和修订者在这方面的学习、研究也有一些进展，深感有必要在修订本中加以补充，使之较为充实。关于中国思想史自身的一些学术问题，如关于学派间的思想分野、融合会通、传承创新，在修订中都有一些新的补充和论述。关于中国宗教思想、近代思想的内容和演变等都是重要问题，依据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及我们自己的看法，也有不少的增补。3. 这里还要提到本书的一个特点，就是每编都有关于思想史原始资料的介绍，便于读者和思想史研究者进一步查阅，此次修订又增加了一些内容，并对主要的资料加以复核，力求准确，也用了不少时间。至今，学术界尚未提供一部完整的《中国思想史史料学》。数年前，我和刘学智教授主编的《中国学术思想编年》一书（全书共六卷，2005—2006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近似于“中国思想史史料学”，读者朋友可以参考。

依据以上所说，此次对《中国思想史》的修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深深感到古人所说的“学无止境”，确实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我们对中国思想史学科内涵的理解，坚持了《中国思想史》1988年版“原序”中所论述的内容。在研究方法上仍然力求做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也是我们一直遵循的原则。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我们体会到：一定社会存在对于该社会上层建筑的“决定”中，并不是机械的，而是辩证的，特别是上层建筑中更加具有理论思维的部分，并不是由经济基础直接决定，而是经过多种中间环节、曲折地加以反映的结果。正是依据这样的原则，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一些思想家，他们的思想难以归之于哪一个阶级的专利品。他们的思想经过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过滤，成为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思维，他们的思想属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创造文明

的过程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他们思想中的精华永远是中华民族子孙共有的精神财富。直至今天，我们还要不断研究他们的思想，传承他们的思想精华。但是，他们毕竟是历史上的思想家，他们生活在古代历史的环境中，其思想中既有与今天时代性相符的方面，也有的刻印了古代历史社会某些滞后方面的痕迹，因此，对他们的思想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在今天和未来都是必要的，既不全部肯定，也不全盘否定，以揭示历史文化发展的内在实质和现代价值，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文化创新。一部专著如果没有创新面，只是老生常谈，那就失去了应有的学术价值。

还要提到，关于社会历史的分析，我们依然使用“封建社会”这个词语，因为我们认为现在还没有更好的词语来代替它。与中国封建社会相适应，在国家体制上是君主专制制度。在皇权统治下，社会的尊卑贵贱不可逾越，等级、阶层与宗族的影响，以及各种形式的人身依附关系和宗法关系随处可见。这些在思想史上如何曲折地反映，在今天如何认识和评价，这是中国思想史研究者应当努力加以解决的学术问题。

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的基本层面，如皇帝和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始终没有改变，但是皇权的治国方略则有所变化，并不是一个模式，而且思想文化对于社会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也有不同的结果。例如，西汉时期的君主专制制度与秦代不完全相同，它主要实施政治、法律、思想文化的儒学化，讲仁义道德，讲国格，与秦代主要用法家理论治国有别。汉武帝刘彻（前140—前87年）在位54年，在他的统治下，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当时的中国以文明和富强而闻名于世。西汉时期，中华文化、艺术都有丰硕的成果。唐代的君主专制制度不完全同于西汉，与秦代也有较大差异。唐代除实行科举选拔人才外，还重视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流，以及中国境内各民族融合带来的文化创造力，比较开放。唐太宗李世民（627—649年）在一定限度内能听取大臣们的意见。唐代还由于儒学、佛教、道教的相互对峙、融合，推动了佛教、道教的世俗化，这种世俗化的总趋势是劝人行善、慈悲为怀，这使国家的文化创造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以上的举例是想说明，即或是君主专制制度也需要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特别是在这种制度下的思想理论未必都和它完全吻合。一定社会制度与思想的矛盾，在中国历史中是经常看到的，需要学人们仔细地剖析，并作出比较准确的评价。

在中国封建社会，除皇权统治外，还有许多思想家在探索如何治国安

邦，如何创造文明，如何提升国力，如何解决社会矛盾，如何选才用人，如何看待天人关系，如何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如何寻找心灵的安顿处，以及如何找到安身立命之所，等等。这些都为中国思想史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资料。

总之，我们在《中国思想史》（修订版）中所着力勾勒、叙述的，主要是想探索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如何创造了思想文明成果，以便我们更好地加以传承和创新。

《中国思想史》1988年版撰写者为张岂之、刘宝才、龚杰、任大援、李晓东。主编为张岂之。

《中国思想史》2011年修订版两卷本参与者为张岂之教授、龚杰教授、刘文瑞教授、张茂泽教授、陈战峰副教授、夏绍熙博士。主编为张岂之。

在本书修订中，龚杰教授不顾年迈体弱，对关于社会史与思想史的关系、关于理学的产生演变、关于宋元时期中国佛教等较重大的问题进行了相当多的增补。刘文瑞教授根据主编提供的提纲，对1988年版《中国思想史》中的近代部分进行了全面改写，展现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丰富内容，也提出了一些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张茂泽教授在修订版中为明、清部分增补了一些新的方面。

还要提到，《中国思想史》修订版从一开始，陈战峰副教授、夏绍熙博士就参加了修订工作，许多繁杂而必不可少的工作主要是他们做的，比如原始资料的核对、增补新发现的资料，以及提供全稿的电子文本等。

这里还要向所有参加修订工作的同志，以及西北大学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部由科研团队所写的书，它的公开出版，只是这部书学术生命的开端。它虽然面世，但它的学术生命如何，要由读者们来决定，作者们并不因此而宣告一切就此结束。对于书的作者来说，应当追踪读者们的反映，更要不断思考书中的不足之处；随着研究的日益深化，就会发现书中还有许多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因而修订的任务便提到日程上。修订，并不简单是文字上的修修补补，更加重要的是对于某门学科内容的深刻理解。这样，一部书由原版到再版，再到修订版，就使书的质量有了相应的提高。当然，这样做会遇到不少困难，如参与人员很难集中精力；在人文社

会科学评价体系中，对于修订工作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等等。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当提倡修订这种做法，因为它能体现作者们在学术研究中前进的轨迹。

张岂之

2011年7月盛暑

于西安市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文化传承创新与大学的使命

张岂之^①

我国高等教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胡锦涛总书记以清华建校一百周年为契机，在讲话中就我国高等教育如何继往开来作了深入的阐述。我想就胡锦涛同志在清华百年校庆讲话中有关文化的论述，谈一些个人学习的体会。

一 为什么需要着重论述高等教育与文化传承创新的关系？

胡锦涛同志在清华建校一百周年校庆上的讲话中，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创新与高等教育的使命有重要的论述。他说：“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要积极发挥文化育人作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掌握前人积累的文化成果，扬弃旧义，创立新知，并传播到社会、延续至后代，不断培育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思想观念，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要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增进对国外文化科技发展趋势和最新成果的了解，展示当代中国高等教育风采，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努力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积极贡献。”要落实胡锦涛同志的这一论述，就需要研究高等教育的使命，在理论上弄清文化传承、创新与高等教育的关系。

中华文化在传承与创新上有丰富的历史积淀，历代学者对此有深刻地

① 张岂之，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所长。

论述。作为世界上没有中断过的民族文化，中国历史就是一部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史。从西周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到辛亥革命的推翻帝制走向共和，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再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的国家在历史的传承与创新中不断前进、发展。仅以儒学为例，从孔子创立儒学，到汉代的经学，再到宋代的理学，近代的新儒学，不断的薪火相传，推动和激发着思想的创新，思想创新又积淀为传统。这种传承与创新，正是通过古代的教育体系（如太学和书院）实现的。西方的文明，也是通过从雅典学园，到中世纪的教会，再到近代的大学得以发扬光大的。所以，大学在文化传承创新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可以说，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就是大学的基本使命。胡锦涛同志明确地论述了这个观点，这正是我国高等教育继往开来的一个关键点。

为什么说大学的使命是文化的传承创新？这是由大学在社会中的位置决定的。一个社会能不能健康发展，关键在于人的发展，而不仅仅是物的丰富。大学在人的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它要培养人才；人才的本质是人，有“才”而无“人”，就失去了大学的真谛。孔子当年反对樊迟学稼，在一定意义上并不是看不起农人，而是强调士人的文化责任。相比起耕作，孔子认为文化上的使命是更重要的。如果大学过分强调技能教育而忽视文化育人，人格养成就可能产生不足。重技术轻教养，重应用轻基础，在文化方面已经有所偏失，亟须校正。现代化本质上要实现人的现代化，而不仅仅是物的现代化。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具有文化底蕴；社会的创新进步，必须具有文化支撑。因此，胡锦涛同志对大学文化传承创新的论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 大学文化传承创新如何构建？

今天，要实现大学文化传承创新的使命，我在学习胡锦涛同志的这个讲话后，有以下体会：

1. 从知识社会和知识管理层面，定位大学的使命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有一些学者就意识到信息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有人认为，21 世纪是知识社会，西方管理学的代表人物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就强调，知识社会和知识经济决定着 21 世纪管理的方向是知识管理。知识管理的组织形态是学习型组织。新型的学习型组

织立足于文化。因此，大学在引领社会方面有着重要作用，与过去相比将会有很大的不同。

所谓知识社会，是人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得到全面发挥的社会。用历史的眼光看，社会的发展，是人自身不断觉醒、不断提高的过程，人类在发展中不断增进自己的自主性和能动性，最终走向自由，走向和谐，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知识社会是人类通向自身解放的一个中间环节。知识社会的特征，就是人的创新能力大大增加，社会的团队融合替代了等级结构。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传承创新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大学要适应知识社会的前瞻性需要。这就是胡锦涛同志在上述讲话中所说的：“知识创新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他又说：“高等教育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的重要结合点，在国家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这个结合点需要文化传承与创新作为持久的有效的依托。

2. 从文化核心层面，确定文化传承创新的基础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人的行为是由内在价值观支配的。因此，我们需要从文化的核心层面，确定传承创新的基础。这就要求我们的大学把价值观培育和道德教育放在首位。通过改进、提升道德教育，使道德教育落实到价值观培育和人格养成上。没有对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所谓创新很有可能走向狂妄；没有对真善美的价值认可，所谓“创新”很有可能出现扭曲和欺诈；没有健全良好的人格，所谓创新很有可能会被功利偏见所利用。任何技术性学习，都需要以精神的和人格的培育为基础。所以，大学应该根据文化传承创新的使命，通过反思和改革完善教育内容，在文化创新中传承，与时代精神密切融合。

3. 从国家和民族发展层面，确定文化传承创新的导向

我们的大学具有重视政治教育的传统，这应当肯定。政治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爱国理念，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民族责任感。文化传承创新需要导向，这种导向不仅是单纯的政治，还需要文化的支撑。单一的经济发展或者单一的政治主导，都有可能造成社会失衡。在大学的政治教育上，如果没有文化的支撑，就可能走偏，有可能出现道德人格与政治理念之间的脱节。大学应该坚持并充实政治教育，以文化和政治的互相联结去培育学生，在政治概念中渗透进文化因子。大学不可能远离政治，关键在于与文化相结合，使它具有科学的说服力，形成传承创新的正确导向。

4. 从人的全面发展层面，确定文化传承创新的内涵

文化传承创新，同人的全面发展，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整体。所以，推进文化传承创新在大学教育的内容中如何体现，是需要认真研究的。我体会，胡锦涛同志提出的文化传承创新的使命，给大学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些新的要求包括：（1）把技能教育与品德教育结合起来；（2）把道德教育与审美教育结合起来；（3）把价值观培育与科学方法结合起来。通过这三个结合，使大学教育的内涵有所丰富和提升。这一方面，需要进行具体论证，也可以通过试点进行探索。其目的是解决专业分工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矛盾。工业化之前的等级社会，社会分工妨碍着人的全面发展；工业化以后的社会，技术分工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事物的整体性，也阻碍着人的全面发展。文化的传承创新，需要在专业化和整体化之间探索出一条新路。因此，胡锦涛同志在报告中所提出的文化传承与创新，需要我们在大学工作的人交出圆满的答卷，我们要学习、总结、提高认识。

5. 文化传承创新的方法，是会通和融合

文化传承创新不是一门学科、一个方面能够实现的，因此，在方法上，要通过会通和融合实现这一使命。20世纪20年代清华国学院成立时，强调学者的“通知”，就是会通和融合的表现。正是这种会通和融合，使清华国学院留下了盛名。在当前，文化的会通和融合，有四个层次：（1）人文和社会科学的会通融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科学发展迅速，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发挥出比人文学者更多的作用，这是好事，但是不能不看到，在一定意义上，学术的功利化和这种偏向有关。实现文化的传承创新，需要重振人文学科，使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各学科能够同步发展，在高等教育中发挥独特的作用。（2）人文与自然科学的会通融合。从世界范围看，早在20世纪中期，英国学者C.P.斯诺（Charles Percy Snow）就提出了“两种文化”问题，即自然科学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缺乏沟通、互不理解的问题。至今这一鸿沟仍然存在。要实现文化的传承创新，就要在这两种文化中消除偏见，打通二者的联系。为此，我国大学于20世纪末叶在教育部领导下开展的文化素质教育，经过16年来的积累，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它只是对若干所著名大学产生了影响，范围有限。今后需要把它纳入胡锦涛同志提出的高等学校文化育人的范畴内，从理论和实践上加以提升。（3）学术与社会的会通融合。学术研究需要静思，但绝不是脱离社会。任何学术研究，都需要面向现实，

与社会发展同步。这就需要大学重视社会实践，落实学者对社会责任的人文关怀，培育学生的社会责任感。（4）人类与自然的会通融合。伴随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是一个不可割裂的整体，人类需要与环境、自然形成融洽关系。大学的学术研究和教学，需要在这一方面有新的突破。

总之，认真落实胡锦涛同志所提出的大学使命之一的文化传承与创新，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加以实践，使大学的使命落到实处。

2011年5月底

目 录

编者的话	(1)
《中国思想史》2011 年修订版新序	张岂之(1)
文化传承创新与大学的使命	张岂之(1)

中国思想史理论研究

思想史学的学术原始创新	龚 杰(3)
诸子各派学说都有价值	刘宝才(15)
《中国思想学说史·秦汉卷》编撰后记	黄留珠(24)
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进展	江心力(28)
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眼光“向上”与“向下” （“向内”与“向外”）	范立舟(34)
中国思想史学科的描述	童 强(42)
“国学”或“古典学”视野下的中国思想史研究	方光华(57)
试论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启示	夏绍熙(62)

宋明理学与经学研究

今本《诗本义》主要卷次内在关系及意义考论	陈战峰(75)
二程和张载的礼学思想比较	王云云(95)
张栻《论语解》的学风旨趣与思想意蕴 ——兼论朱熹对张栻《论语解》的辨析	肖永明(107)